

第三编 全民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

第八章 白石水人民抗日自卫武装斗争

合浦人民反对运米资敌斗争，是抗日人民在战争区域和敌后区域反对民族败类资敌卖国的抗日救国斗争。积极反共的广东第八区专员邓世增和合浦县县长李本清诬指这是共产党的“暴乱”，决定实行武装镇压。他们首先镇压西场区（含沙岗）的斗争。西场人民反对运米资敌的正义斗争被镇压下去了，民族败类的运米资敌活动又猖狂起来。不久，邓世增又决定派兵镇压小江区的反对运米资敌的斗争。由于中共小江区委和群众没有抵抗国民党武装镇压的思想和实际准备，导致国民党顽军得以长驱直进，围村捕人，并强迫廉州中学同迁廉州，最终把运动镇压了下去。

1940年5月，国民党顽军到小江区镇压反对运米资敌斗争的第二天，中共合浦中心县委书记黄其江接到邓世增一两天内派兵镇压白石水区反对运米资敌斗争的情报，立即于当天赶到白石水区，晚上召开区委会议研究对策。会议总结了西场、小江斗争的经验教训，一致认为，如果白石水区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镇压不进行武装自卫，势必重蹈小江的覆辙，招致斗争失败、人民遭殃的恶果。于是决定：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进攻，坚决进行武装自卫。

第一节 进行“团练”誓师

白石水农民过去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团练”是当地一种凝聚力量的形式。在区委会议上，张世聪提出利用当地过去惯用的“团练”形式来一次大动员、大检阅。经过充分讨论，取得共识，并决定：6月2日在大成椏檬坳举行“团练”誓师大会，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准备武装反击国民党顽固派镇压群众抗日反汪斗争。

1940年6月2日，白石水地区的红岭、金街、勾刀水、大成、柑子根及当地周围大小村庄的农民、青年、师生的队伍和张黄、旧州的部分青年学生以及当地各阶层人士共1000多人（含数百武装人员）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椏檬坳。参加“团练”的人们不断高呼口号和歌唱抗日歌曲，此起彼伏的歌声和口号声响震着周围山岭，整个会场十分热闹。整顿好会场后，张世聪英姿勃勃地走上讲台，全场肃静起来，大家注视着这位名扬八乡的群众领袖。张世聪以沉着坚定的语调，回顾了大半年来斗争的历程，总结了斗争胜利的经验，指出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反共反人民，战火已经烧到合浦沿海和邻县灵山，做亡国奴的危险就要降临头上。而国民党顽固派镇压了西场和小江人民的抗日运动后，正在准备镇压白石水区的抗日人民。他讲到激动的时候，拔枪朝天连放三枪，以示斗争的决心。他用最

通俗的语言提出简单而又尖锐的问题，请群众回答，一步步启发引导群众分清大是大非，让群众自己下决心作出选择。参加“团练”的群众在张世聪的鼓舞和引导下，信心增强，纷纷表示愿意和张世聪一起团结一心，抗击顽固派的武装进攻，同生共死，战斗到底。张世聪讲话后，接着是几个代表讲话和表示抗战的决心。随后，张世聪叫人牵来一头山羊，当场杀羊取血冲酒，分给大家，张世聪带头举杯说“誓与来犯之敌血战到底，永不反叛！”大家一齐举杯，一饮而尽。“歃血为盟”之后，张世聪提议各村组织武装游击小组，日夜轮流放哨，以螺角声为号，发现敌人，一齐出动，誓与敌人决战到底。之后，数百支枪朝天鸣放，宣告大会胜利结束，也奏响了白石水地区武装斗争的序曲。

椏檬坳的枪声令白石水方圆几十里的反动分子惊慌失措，纷纷向国民党当局诬告张世聪“聚众造反”，并纠集和组织反动力量配合国民党反动武装向白石水、大成人民进行野蛮、残酷的反复“扫荡”和进攻。

第二节 第一次反“围剿”

誓师大会后，人心振奋，各村群众加强戒备，随时准备迎击来犯之敌。国民党顽固派和汉奸、卖国贼知道白石水民众严阵以待，一时也未敢轻举妄动。但一个多月后，国民党合浦县当局策划组织了围剿白石水抗日反汪革命运动的行动，企图捕捉共产党的领导骨干和革命教师。

1940年6月8日（农历五月初三），临近端午节，民众一面备战，一面包粽子准备过节。邓世增派合浦县县长李本清亲自率县自卫大队，并纠集石康、多蕉、旧州、张黄、马栏、白石水、北通等地的乡保队1000多人，兵分五路，同时奔袭并包围了柑子根、东馆、金街、红岭4间小学和周边村庄。县委提前得知县自卫大队的行动计划，及时通知白石水区委。白石水区委领导李英敏、张世聪、王克、朱兰清等按照预定计划奔赴三角塘村附近秘密集合，分析情况和研究对策。下午2点左右，早有准备的所有群众和武装人员听到螺号声，便纷纷响应，武装人员迅速占领山头，其余男女老少群众撤离村庄，分散上山隐蔽。

李本清听到震天动地的螺号声，吓得全身发抖，手端着一碗糖水准备喝时全部抖落在地上。自卫队向各小学进攻时，东馆小学罗德崇和蔡琳两位女教师因撤离行动比较迟缓被自卫队抓住，其他人均安全脱险。自卫队虽然抓了两位教师，但他们已陷入人民群众的武装包围之中。在人民武装的压制和封锁之下，自卫队只得龟缩在几间学校之内，互相间无法通讯联系。当晚，白石水区委决定一面严密封锁包围，放枪骚扰，使自卫队不得安宁；一面开展政治攻势，进行火线喊话，说明白石水人民是主张团结抗战，反对汪派汉奸和贪官污吏的，不是什么“土匪”“奸匪”，希望大家不要受李本清、梁文光的欺骗，为他们送死，指出他们这次武装进犯白石水地区，残害抗日穷苦兄弟，是上了反动头子的当，是为虎作伥，是汉奸行为，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一致打日本、保家乡”等口号，

警告他们赶快撤退回家，否则后果自负。这些自卫队和乡保队员都是被骗来的，原本就没有跟人民作战的决心，经过这一晚的骚扰和政治攻势，他们在政治上已经动摇瓦解，又加上一天一夜没吃好吃一顿饭，觉也没睡好，惊恐万状，第二天一早，大部分便撤回去了。

盘踞在东馆小学的那股自卫队，因为抓了两位女教师，又抢走勾刀水村群众的财物耕牛，群众愤怒之极，趁夜进行几次冲杀，由于该校在小山头上、房屋较坚固，没能冲进去。第二天，自卫队曾派兵突围出去请救兵，但被打回去了，这股自卫队饥渴大半天，受不了，有人已逃跑。白石水区委从这些逃兵处了解到，这股自卫队多是石康、多蕉的自卫大队，大队长姓劳，原来是张世聪、李英敏中学时的同学，便决定以张世聪的名义给劳某写一封信，信的内容主要是对劳某进行批评警告，并提出三个条件：一是立即释放两位女教师；二是归还所有抢劫人民群众的耕牛和财物；三是立即撤兵，返回原地区。如能执行这三个条件，就马上停止进攻，保证他们安全撤退。武装队伍派人把信送给劳某，罗德崇也认识劳某，私下对他做了工作。最后，劳某及其部全都接受武装队伍的条件，当天下午4点多钟，两位被捕的女教师获释。武装队伍派人拿东西给他们吃，随后，把队伍撤到两侧，让开一条大路，通知他们撤走。这股乡保队慌慌张张、争先恐后地夺路而逃。

乡保队退走后，大家兴高采烈，正在东馆小学门前的空地上听张世聪动员，准备转移去围攻驻在金街学校的自卫队。就在这个时候，李本清率领的县自卫大队从金街来袭，双方发生战斗。武装队伍当机立断，把队伍分为两部分，派少部分队伍集结在东馆小学后面的高山上，居高临下打击自卫队。自卫队不仅不敢进入学校，还惊慌失措，彻夜不眠。在上山和自卫队战斗时，张世聪的胞弟张世柏光荣牺牲。这是六万山区武装斗争中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年仅20来岁。

张世柏牺牲的消息传来时，张世聪心情十分悲痛，决心要为张世柏报仇。他利用张世柏牺牲一事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以教育群众，誓死和国民党顽固派血战到底！

队伍撤退时，张世聪估计，自卫队必然进攻他的老家勾刀水村，便布置黄家祚和张体宽带11个武装队员到村中掩护群众疏散。当晚，李本清果然派县自卫大队的一个中队和驻在金街、红岭几个乡的自卫队共三四百人，重重包围勾刀水村。勾刀水村有100多人早已撤走，村中的围墙和炮楼都比较坚固，村里只有黄家祚等13名战士，13支步枪，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为保卫勾刀水村，他们和自卫大队展开了殊死的决战，凭着村中比较坚固的围墙和炮楼，抵抗自卫队疯狂的进攻，打得非常英勇顽强。来犯的自卫大队由李本清亲自督战，反复冲击，企图拿下炮楼，然后冲进村里，但是被英勇顽强的13名勇士打退。勾刀水村三天三夜的保卫战打得自卫大队无法攻入，自卫大队被击毙10多人，连县长李本清的面部也被打伤。自卫大队在战斗无果的情况下，李本清狗急跳墙，指挥几次搏命的冲锋，机枪猛扫，手榴弹乱扔，曾冲到门边企图放火烧闸门，但都被13名勇士沉着机智地打退。

到第三天晚上，坚守在村里的勇士眼看子弹快要打完，再坚持下去会陷于更加困难的境地，大家商议，决定趁自卫大队疲劳不堪、防备不严时撤退，于是，到下半夜，趁对方不备，打开后门，利用熟悉的地形，神不知鬼不觉地摸了出来，机智安全地撤离村子。13名勇士撤出村子后的第二天下午，自卫大队才战战兢兢地攻进村里，可是一个人影也找不到，扑了个空。

激战三天三夜的勾刀水保卫战，革命武装队伍大获全胜，自卫大队遭到惨败，最后恼羞成怒，进村大肆抢劫之后，将早已带来的煤油洒泼上所有门窗楼板，一把火把勾刀水村烧成废墟。

自卫大队的武装进犯的烧杀抢掠行径，极大地激怒了白石水、大成人民，也使广大群众看清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本质。李本清在战败后无可奈何，只得拼凑一个以地方反动头子余楚江、黄南滨、黎植三为主任、副主任的“第三区剿匪委员会”，留下一个县自卫队驻在勾刀水村边的东馆小学，留下大塘的反动保队驻在芳塘，并在平山坡建立一支反动保队，企图继续监视和限制农民武装队伍的行动。然后，李本清带着其余队伍灰溜溜地逃回合浦县城廉州。

至此，经过10多天的“围剿”和反“围剿”的激烈战斗，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军事“围剿”以失败而告终。

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围剿”后不久，中共合浦中心县委为了加强白石水的武装斗争，便从各区抽调一批党员骨干到白石水充实武装队伍。李英敏被调离白石水，王克继任区委书记。白沙、公馆的人员由周洪英带领（白沙的人员有廖上智、赖子能、赖子坤、蒋四哥；公馆的人员有吴十四哥、吴亚南等八九人），奔赴白石水，决心和国民党顽固派战斗到底。

第三节 争取抗日的二十六集团军司令部的支持

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围剿”被粉碎以后，顽固派和革命武装队伍都在重新组织力量，调整部署，准备新的战斗。同时，双方都在积极争取驻灵山一带的二十六集团军司令部的支持，使自己处在有利的地位，以便更有效地给对方更有力的打击。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就是积极抗日，并组织 and 指挥了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他因为力主抗战而受到蒋介石排斥和压制，以后又和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发动“福建事变”，主张反蒋抗日。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便把他调离抗日前线，驻在粤桂边的灵山一带。

1940年六七月间，中共合浦中心县委和白石水区委派出朱兰清、黄春泰等人为代表，到灵山三海岩二十六集团军总部递交呼吁书。随后，两个军官接见朱兰清等人，听取了朱的申诉和要求。主要是控诉合浦县县长李本清等贪官劣绅与奸商勾结，运米资敌，破坏团结抗战，镇压抗日人民的罪行。要求二十六集团军主持正义，支持抗日民众，打击奸商，

制止官军镇压和屠杀人民。两个军官听了以后，虽然没有公开表示支持，但交谈中流露了同情的态度，并答应向总部汇报再酌情处置。

大约在这个时候，二十六集团军总部收到国民党八区专员兼保安司令邓世增和合浦县长李本清发来的电报，说合浦的白石水乡“奸匪”暴乱，请速派兵镇压，电报刚好落在兼任蔡廷锴将军秘书的张凤楼的手上。张凤楼是二十六集团军中的秘密共产党员，与灵山地方不发生关系（其父张文是国民党有名望的老党员，在国民党军队中有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副省长，广东民盟副主任委员），他接到电报后，先交给当时二十六集团军政工队的共产党员莫平凡，并征求莫的意见，莫平凡当即找时任灵山特别党支部负责人罗英商量，决定先推说情况不明，待派人调查了解后再行处理。张将此意见报蔡廷锴，蔡即表示同意，并由张凤楼起草电文答复邓世增和李本清。

经过张凤楼从中努力，二十六集团军总部决定从政工队派出中校队员劳耀祖（灵山大塘人）带队，并由莫平凡、邓业兢、何林和温之淮4个在二十六集团军政工队的共产党员或进步分子参加调查组，带着二十六集团军的手令前往白石水。劳耀祖骑马，其他几人走路，因天气很热，邓业兢中途中暑病倒折回，其余4人一天便赶到白石水。参加调查组的人早已听过灵山党组织关于国民党镇压白石水群众斗争的传达，出发前一天，已由共产党员张家保派人把调查组要去调查的消息通知白石水的党组织。

调查组到达白石水乡公所后，反动乡长等人一面造谣诬陷白石水、大成群众的抗日革命行动是奸匪暴乱，一面拿出一些所谓的“证据”，其中有张世聪的告人民书、标语、口号等，还指着抄来的一副贴在小学门口的对联“凯旋门是白骨筑就，自由花乃热血浇成”，说是共产党的证据；还说过去不知道张世聪、朱兰清等人是共产党，只见他们出出入入，以为他们只是教人唱歌，宣传抗日，谁知他们是共产党，组织了几千人、几百支枪和政府对抗，搞暴动等。白石水乡公所这些人得意洋洋，口沫横飞，企图蒙骗调查组。

调查组住进白石水圩上的一间当铺，离乡公所不远，第二天下午，反动乡长一伙人又来啰嗦，希望调查组接受他们那一套。第三天，调查组便到勾刀水村了解情况。勾刀水小学驻有县自卫队的一个中队，他们见调查组的人穿着军装，佩戴二十六集团军的徽章，便出来迎接，讲一些“奸匪”怎样打他们，他们怎样把“奸匪”打败，并指着后面的大山说还有些“散匪”走上了那个大山等胡话。调查组看见勾刀水村全村被烧，已经变成一片废墟，便问自卫中队的队长是不是他们烧的。他们起初说不是，后来又说是。劳耀祖批评说，不应该烧老百姓的屋嘛！那个中队长还硬着嘴说“奸匪”打官兵，否则是不会烧的。这些家伙明知理亏，也不好多讲。一连几日，调查组早出晚归了解情况，仍然住在当铺里。

第四天晚上，地下党派一个人来向调查组介绍真实情况，调查组表示同情和支持。他们本想见张世聪，但又觉得不便，便提出要见见游击队负责人，于是约好三天后到红岭小学见面。那里正在开大会，武装队伍也集中在那里，莫平凡和何林两人去了，他们在那里

见到了朱兰清等人。大家要调查组讲话，莫平凡和何林都讲了，说经过调查，白石水、大成老百姓自动起来反对奸商运米资敌是对的，表示支持。朱兰清也讲了话，表示坚决把斗争进行到底。

调查组在白石水住了10天，在见到游击队后的第三天就要离开。在离开之前，调查组到乡公所同反动乡长等人告别时，劳耀祖对他们说，白石水群众的行动是对的，运米资敌是不对的，群众起来反对无可非议，应该和群众好好商量，放火烧屋是错误的。反动乡长面红耳赤，不敢作声，只是苦笑着支吾搪塞而已。

调查组取道小江再回灵山，在小江潘屋村党掌握的印刷厂里，莫平凡和何林向地下党的领导介绍情况，讲了一个下午，第二天便回灵山。

回到灵山后，调查组向张凤楼汇报调查结果，再由张向蔡廷锴汇报，说白石水奸商运米出境资敌，民众起来反对是对的，当地政府派武装护送运米，和民众发生冲突，张世聪、朱兰清等没有不法行为，要惩办的应该是李本清、梁文光等人。蔡廷锴听汇报后低头不语。随后，二十六集团军电告邓世增、李本清，指出白石水的武装冲突纯属内部纠纷，宜和平解决。蔡廷锴这样处理白石水问题，是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场上，敢冒风险，拒绝派兵镇压，实际上是支持白石水人民的自卫斗争。

蒋介石为了加强反共，排斥异己，一两个月后，国民党西南行辕派一个军官取代蔡廷锴的参谋长，不久，蒋介石下令彻底“清剿”白石水的“暴乱奸匪”并撤销蔡廷锴的职务，把蔡廷锴调到桂林。国民党顽固派还通过已退休的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师长张梅新，其利用宗族关系，派人劝张世聪说：“只要你们放弃武装斗争，并离开这个地区，政府都可以给你们做官。”企图分化和动摇革命队伍，均被张世聪严词批驳，断然拒绝。

第四节 开展舆论宣传

在反“围剿”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除了积极进行军事斗争打击国民党顽固派，还积极开展政治舆论宣传工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伎俩，戳穿其欺骗谣言，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让各阶层人民了解事实真相，以便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争取主张抗日民主的进步势力，孤立和打击反共反人民的顽固派。在开展宣传舆论工作方面，白石水的党组织也做得很出色，他们发了不少告人民书、宣言、快邮代电和各种传单，或派人四处散发张贴，或通过邮政寄送，遍及邻近各县以及国民党的一些军政机关和人民团体，使各阶层人士对白石水斗争的真相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起到很好的作用。

中共白石水区委宣传委员王克（后任区委书记）主管宣传舆论工作，积极组稿写稿，还办了一个定期出版的《大家读》三日刊，这些都是在国民党顽固派经常封锁破坏的恶劣环境下，由蔡琳等几个人在油灯下刻写蜡纸油印出来的。

1940年7月16日，《大家读》发表题为《所谓剿抚》的社论，揭示了白石水武装斗争

的历史背景，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旗帜鲜明地支持白石水武装斗争。下面全文抄录当时这篇社论：

所谓剿抚

最近合浦县新设立之第三剿匪委员会主任委员余楚江、黄南滨、黎植三等为了白石水米案事件，在白石水、旧州各处，贴出了会字第二号布告云：“照得非法集会，企图煽惑愚民，治安既被扰乱，复敢抗拒官兵，无知胁从可宥，首要难免极刑。本会奉命剿抚，宗旨首在和平，胁从立即解散，归农共保安宁，首要能知悔过，亦准缴械投诚，土匪掳杀抢劫，厥罪原属非轻，如能立功赎罪，一律准予自新，若待大兵剿洗，自然皂白难分，为此谆谆告诫，慎勿冥顽不灵。”

这篇东西，显然是具有深切的政治作用，这样处置白石水问题，不能不令人痛心，而为合浦抗战前途喟然兴叹，且不能不令人对黄南滨先生等所有惊疑其中日寇之政治分化，与汪派汉奸的投降阴谋。

白石水民众抗战力量，经过艰苦发动而团结起来，曾予合浦汪派汉奸以严重之打击，自大成团练后以至于武装斗争事实，证明了白石水民众在团结进步立场下，立了不少反汪功绩，奠定了合浦坚持抗战之基础，这些团结是服从了民族利益，有补（利）于国家前途，根据抗战建国纲领，抗战的集会结社是绝对自由的，当然无所谓非法，如说是非法，只有非汪派汉奸之法，非南京伪政权建立下之法。参加集会之同胞亦当知其为爱国志士，进步份（分）子、与汪派汉奸立场迥然不同，在汪派汉奸之军事扫荡下作英勇坚决之反击，不独维持白石水之治安，不为汪派汉奸之捣乱，而且保护了全南路而进行不屈不挠而奋斗，如是说“愚民”，只有卖国者才是狡猾乌龟，如是说是扰乱治安，抗拒官兵，至好是做顺民做走狗，欢迎执行汪派汉奸意见残杀老百姓之所谓“官”和“兵”，服服帖帖地似维持会一样姿态来维持所谓皇军式治安。

白石水民众以国家为重，坚持团结，不愿作豆箕（萁）之惨剧，解释与联合各处被骗来攻打白石水各地的同胞，使之觉悟归去，这种和平方针，是何等绝对正确的，为了清除汪派汉奸之卖国罪行而维持地方之和平，这又是何等极端正确的，这种自动英勇爱国之精神为各地所罕见，中华男儿之模范，自无所谓胁从，无所谓首要，而此种行为，亦应在粉碎敌人南侵政策下更坚持团结下去，不会因此而动摇，抗战政府亦应扶植之，培养之，使成为保卫合浦之主要支柱。惜剿匪委员会等，以“无智胁从者宥”为分化之口头禅（禅），以“胁从立即解散”为解散这些群众团体之狂吠，以“缴械投诚”为消灭武装力量之手段，以“首要难免极刑”为威胁进步分子之毒计，以“土匪掳杀抢劫”为欺骗民众之技术，以“立功赎罪”为利诱之阴谋，更以“大兵剿洗，皂白难分”为恐吓当地民众之主要狡计。以此对付白石水事件，诚令人奇哉怪矣！所谓“首要”，我们视之为反汪健将，视之为抗日健将，汪派汉奸当然视之为其罪人主要，所谓“土匪”，只有劫人之舍，抢人之财，才为土匪，李县长所率到白石水之官兵，劫财掠物，烧毁民舍，甚至米粮镰刀，一鸡一鸭，俱夺而去，此不谓“土匪”，而以反对贪污、反汪救国为“土匪”。

此简直纯粹学会了日军之口吻，骂东北义勇军为“土匪”，俨然一班，噫以“土匪”之名，“首

要”之词加诸爱国同胞，复以分化威吓之手段，来予以极端摧残，犹所谓“谆谆告诫”，“首在和平”，不怪令人叫绝。南滨先生执行汪派之意见如此细心、如此尽忠，以“谆谆”态度郑重来为日鬼谋“东亚之和平”。

在同期《大家读》的“来函照登”栏内，还刊登了“旧州白石水民众反汪救国会”致《大家读》编辑部的信，亦摘要抄录如下：

《大家读》编辑部钧鉴：

本乡自于汪派汉奸惨屠酷杀后，本会仅遵蔡总司令之意旨，静候和平解决，但一般顽固分子执行了汪派汉奸意旨，成立了“剿匪委员会”，诬蔑吾人为“土匪”，先以分化手段欲瓦解吾人之团体，威胁利诱，以消灭吾人之力量。最近……公开贴出会字第二号布告云“……（与上同，故略）”，并由当地××负责编集武装力量，征缴没收民间枪械，以造成再次屠杀之主力，今本乡民众既皆惊，互相屠杀之惨，不愿助长顽固派之凶焰，到处皆拒缴出，即连其顽固分子之心腹，亦表示怀疑，反动者如包光华亦不敢相信缴出枪械，照此种举动实有害团结抗战，当此敌人南侵，家乡危急，敌机日日飞经白石水一带，显然汪派汉奸有意配合敌人进攻，出此一举以准备由白石水到达灵山要道事先扫荡为敌人先锋。本会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坚持进步，既遵蔡总司令意旨静候事件之和平办理，不过汪派顽固如此布置，深感各地同胞，不能周知，敬希贵刊登出，以俾得各处同胞，明瞭真相，阻止汪派之出卖家乡行动，为保卫合浦之实现。

此致

民族解放敬礼！

旧州白石水民众反汪救国会启

这些文章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汪派和顽固派的造谣宣传被揭穿，广大群众认识了他们的反动丑恶面目，大家都知道白石水军民是顶天立地的抗日救国英雄，绝不是汪派汉奸和顽固派诬蔑的“土匪”和“奸匪”。经过宣传，所有行经白石水、大成根据地的商旅，都认为这里是最安全的地带，许多人还以其亲身经历，做了义务宣传员。

第五节 特委的巨大支持

白石水的政治斗争发展为武装斗争，事先南路特委是不知道的，特委接到报告后，认为抗日反汪的群众民主运动，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武装镇压，迫得群众实行武装自卫，这一武装冲突完全是国民党投降派挑起的，是正义的自卫斗争，于是坚决支持，并指示中共合浦中心县委和白石水区党组织，按照中央指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坚决给予敢于来犯的敌人迎头痛击，同时要注意策略，要坚决贯彻“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利于团结抗战，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此，南路特委通报号召所属各县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声援和支援白石水人民的正义斗争。特委还在一些党内通讯和刊物中，宣传报道白石水斗争的正义性，揭露汪派汉奸

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投降阴谋，号召各阶层起来反对和制止汪派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破坏进步的反动罪行，给予汪派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很大的打击。

1940年7月，南路特委决定派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熟悉军事知识的特委委员陆新到合浦任军事特派员，协助合浦中心县委领导白石水的武装斗争。这对白石水军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特委领导找陆新谈话时，考虑到陆新的爱人周新正在患病，便提出两项工作征求他的意见：一是去广州湾赤坎办党员训练班；二是到白石水去。说白石水斗争很激烈，那里没有人搞过武装斗争，知道陆新在延安学过游击战术，所以希望他去白石水领导武装斗争。陆新不假思索便回答说，去白石水，党需要就去，没有意见。陆新的爱人7个月前曾经流产，当时正患重病，但为了革命，他毅然决定服从党的需要，到艰苦困难的斗争前线去。

陆新和合浦中心县委书记黄其江一起，从广州湾出发步行到北海。在一间黑暗而又没有灯火的房子里和其他县委领导开了一晚上的会，确定陆新作为县委特派员，领导白石水区的斗争；组建白石水武装的常备队伍和群众队伍，坚持武装自卫斗争。随后经中站，由白石水区委书记王克陪同，于8月初到达白石水区的上坝村钟大伯家里见到张世聪、朱兰清等人，传达了特委指示和县委决定后，研究怎样发动群众继续坚持和开展武装斗争等问题。

陆新到白石水大成山区后，大家亲切地称他为陆先生，有时叫他作表哥，虽然没有对外宣布他的职务，但大家心里都知道他是上级派来领导群众抗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对他十分尊重和尊敬。几个月后，周新病逝，陆新强忍心中的悲痛，做好党安排的工作。

陆新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调整了党的领导机构。除保留仍由王克任书记的区委，另外成立武装队伍党组织，由陆新、张世聪负责，朱兰清、廖上智参加，专门领导武装部队和武装斗争工作，由陆新统一武装党组织和区委的领导，协调这两个组织的行动。按县委决定组建一支精干武装队伍，作为武装斗争常备的中坚力量。这支队伍最多时达七八十人，少则二三十人，有时分散活动，发动群众，有时集中起来应付敌人。陆新亲自抓武装队伍的军政训练工作，他按照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中阐明的政治原则和军事原则，结合白石水武装斗争的实际情况，向武装骨干队伍讲授许多军事课和政治课，特别详细讲解“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等人民战争的战术原则。陆新还领导部队开展军事训练，从放哨站岗、紧急集合、行军联络、传递口令到利用地形地物、瞄准射击等科目都进行了训练和演练，使这支年轻队伍的革命战士掌握许多应付敌人、打击敌人的办法和本领，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为了长期坚持和发展武装斗争，除了建设一支坚强的脱产骨干武装队伍，还要发动群众，组织大量的不脱产民兵队伍，平时分散生产，保卫村庄和群众。当时不脱产的民兵组织，各地各村都普遍组织起来，组织得最好的是以柑子根、楠木根、枫木根、佛子岭、木

头田等村庄为中心的一大片地区，这一带成了武装基本队伍活动中心地区。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加强训练，提高战斗力，准备粉碎国民党顽固派新的进攻。许多村庄的民兵，采取白天生产，晚上训练的办法，没有月光时，有的民兵队伍就在山麓草坪中点起汽灯进行军事训练，士气非常旺盛，对胜利充满信心。

在这段时间里，整顿了党的组织，调整充实了各个支部，总结了粉碎第一次“围剿”的经验，表扬了大批机智英勇、坚决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武装斗争的党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鼓励他们带动群众，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坚决和国民党顽固派战斗，迎接和打击顽固派新的进攻。

白石水区群众手中的武器大部分是本县古立、三合、北塞等地群众土造的，弹药奇缺，打了几仗之后，子弹已经所剩无几，白石水区的经济不发达，群众很穷，无法维持数十人的常备武装，粮食给养也十分困难。为了解决装备和给养困难问题，部队白天在山上训练，夜晚搞竹器编织、造纸等，托群众运到圩镇出卖，但这只能解决部分生活困难，很多时候还是靠张世聪、朱兰清等的家庭及亲友帮补和支持。中共合浦中心县委发动党员和各阶层群众捐款捐物，支援白石水斗争。有一次，由谢王岗亲自携带所捐款物送到红岭村交给王克，尽管数量有限，但给了部队很大的鼓舞。曾经下令进攻白石水群众的国民党八区专员邓世增和其他一些反动官僚的亲戚，或是共产党员或是进步青年，他们都设法在家中弄些钱物和武器支援白石水群众的斗争。国民党八区保安副司令陈国勋的儿子陈琪，有一次就筹到百发子弹，经公馆、白沙区委负责人徐永源处转送白石水武装部队。

第六节 第二次反“围剿”

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对白石水、大成地区的第二次武装进犯。这次进攻仍然由李本清亲自率领，以县自卫大队300多人为主力，纠集北通、白石水、张黄、马兰、旧州等地的乡保队共1000多人，分五路突然进攻白石水中心地区大成、楠木根垌、木头田、三角塘一带，企图歼灭白石水武装大队的主力，打散白石水地区的武装民兵，捕杀白石水地区的中共党员和干部。由于陆新事先已获得县委送来的情报，白石水地区的党员干部早有准备，主力、民兵和工作人员都撤上了山头，自卫大队扑了个空，除了掳掠群众的财物，一无所获。

自卫大队进入白石水中心地区后，采取分兵驻剿的战术，在白石水中心地区及周围的平山坡、芳塘、东馆、大成、新田垌、公鹤塘、柑子根、珠禄窝、木头田、石碑坝等地建立许多反动武装据点，有的据点之间相距不及0.5公里。他们用军事进攻、政治分化和经济封锁三管齐下，妄图一举彻底消灭白石水武装力量。在军事上，反动武装以这些据点为依托，四处围村、搜山，到处抢掠烧杀，在摩单垌一个小村放火烧毁群众的房子，枪杀两名无辜群众。共产党员钟晚哥（朱恒山）是柑子根小学的炊事员，在学校被自卫队围捕抓

到，因为他是朱兰清的叔父，顽军硬说他是朱兰清的死党，对他进行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企图要他供出白石水武装部队及地下党的情况。钟晚哥忠贞不屈，闭口不泄露党的秘密，直到顽军把他枪毙，表现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坚贞气节。顽军企图用军事占领来限制白石水武装队伍的活动，妄想把白石水武装队伍赶出外围地区，消灭白石水的武装力量。在政治上，顽军通过地方的反动分子进行欺骗，强迫群众去开会，听李本清“训话”，强迫群众集体“自新”，强化保甲制度，实行“十户联保”等，企图用这些办法来瓦解和破坏武装大队的群众基础。在经济上，实行经济封锁，主要办法是实行小村并大村，把大村围起来，严格管制，出入检查，不准群众自由行动，不准带粮食等物资外出，企图切断武装大队与群众的联系和一切接济。顽军的阴谋是十分阴险毒辣的。

在第二次“围剿”期间，除了县自卫大队和各乡镇的乡保队，国民党顽固派还调来正规军一七五师的一个营，营长黄秉元（他的哥哥黄秉权是团长），营部驻在芳塘，三个连分别驻在山岐附近的石坝、旱坡等村庄。白石水武装大队了解情况以后，实行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政策，在各条交通大道上写了很多标语，说明武装大队的政治主张，揭露顽固派的阴谋，表明人民武装“只打反动的自卫队”“不打抗日爱民的军队”，号召“团结抗日，争取最后胜利”等。思想宣传工作收到很好的效果，武装大队领导又发动群众给正规军送去一些食物，表示慰劳抗日官兵，使他们很感动，从此，这个营的正规军按兵不动，没有出来骚扰白石水武装大队。

陆新以脱产的武装队伍为骨干，集中了楠木根、枫木根、木头田、黎家塘等地的武装民兵共 200 人，组编为一个大队，由张世聪任大队长，和指挥部一起在佛子岭一带的山上流动隐蔽，伺机打击顽军。因为武装大队有良好的群众条件，又有深山密林掩蔽，对地形和路线熟悉，虽然离顽军很近，但顽军无法发现武装大队，顽军像盲人一样，到处盲目乱窜。

对这次顽军的“围剿”，武装大队自觉运用毛泽东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和顽军展开游击战。有一次，顽军找人带路，出动搜山，事先群众就来报告顽军的行动计划，武装大队便布置一支小分队埋伏在顽军准备搜索的一片树林中，树林很密，离得很近也看不见人，待顽军来得很近，小分队一齐开火，打死一些顽军，顽军乱作一团就跑了，小分队也迅速转移，等到顽军重新组织队伍包围过来时，已找不到小分队，扑了个空，初战吃了亏，一个多钟头后就撤退了。

过一两天，顽军又出来搜山，搜了大半天，弄得精疲力竭，也没有搜着武装队伍，当他们把队伍拉回到离驻地三四里的路上时，被陆新派出的几个武装小组秘密行动接近，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惊慌失措，丢下几具死尸仓皇逃命。武装队伍打了就走，顽军看不见，摸不着，奈何不得。有一次，武装队伍一个游击小组在黄峰岭上隐蔽，准备伏击过江的顽军。顽军一个兵大声喝问，哨兵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好在隐蔽

在哨兵旁边的黄超志眼疾手快，一枪就把那个大声喝问的兵打死，趁着顽军慌乱的时候，几个人一齐向顽军开火，并乘机转移。

有一次，武装大队在公鹅塘、木头田、楠木根和东馆各个顽军的据点之间的交通线上埋伏两个武装小组，每组五六个人，一股顽军中伏，被打死打伤三四人，另一据点的顽军来援，又被另一小组伏击，打了一阵，两个小组便翻山越岭，隐没在丛林之中。有一天，顽军逼着群众在一个村庄的地坪上开大会，造谣恐吓，诬蔑武装队伍是“土匪”。武装队伍派出一些战士到附近山头打枪，顽军乱了，群众也乘机走了。

晚上，武装队伍凭着夜幕的掩护到处骚扰顽军，搞得顽军更加不得安宁。差不多天天晚上武装队伍都派出几个游击小组，摸近顽军的驻地周围放枪、喊话，警告和瓦解顽军。自卫大队队长何伯钧驻在柑子根学校，有一晚武装队伍一组人摸到学校门口一齐开火，就像机关枪连发一样，吓得自卫大队官兵连觉也睡不着。有一晚，突入相隔仅半里的柑子根和珠禄窝两村之间，同时向驻在两村的自卫大队开火，打了之后便撤，两村的自卫大队互相误会，竟对打了半个晚上。

武装大队就是这样运用毛泽东的游击战术，用伏击战、麻雀战日夜袭扰顽军，打得顽军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要找武装大队找不着，但随时随地都有被武装大队打击的危险，顽军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这样经历了半个多月时间，打了数十仗，毙伤二三十个顽军士兵，而武装队伍无一伤亡。顽军的军事扫荡、政治瓦解、经济封锁等等阴谋通通破产，最后李本清像第一次“围剿”失败一样，无可奈何，只好多留下一个自卫中队在柑子根建立一个据点，和东馆据点形成犄角之势，监视武装大队活动，之后便带着其他队伍溜回廉州去了。

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围剿”，又以失败而告终。

第七节 木头田之战

李本清率自卫大队撤退以后，武装大队便让民兵分散活动，回到各个村庄附近的山上去。许多小村庄的群众被顽固派强迫并村赶到大村去，小村庄的民兵只能在山上，有时也回到撤空的村里去，一面警戒，一面搞生产活动，坚持和国民党顽固派作长期的斗争。

木头田村早已被迫并村，群众都搬到大村去了，只剩下一条空村，稻谷熟了也收割不了，该村民兵队队长（大家都叫他木头田大叔）要求武装队伍帮助收割。陆新、张世聪答应他的请求，带领武装骨干队伍20多人进驻木头田村，驻在村子一端的两座土楼里。第二天早上，部队派出警戒后，便开始出去割稻谷，张世聪另派张体宽出去通知群众割张世聪家的稻谷，作为军粮。张体宽在离村不远的地方和一股顽军相遇，他怕自己的队伍不知道，便和顽军打了起来，用枪声报告部队。随后，他和队伍都退回到村里，顽军跟着包围了木头田村，于是，战斗就打了起来。

顽军越来越多，占领了周围的山头。清早顽军发动几次进攻，占领了大半个村的平房，只有武装队伍驻扎的两座土楼无法攻进。由于木头田后背山很高很陡，山岭逼近楼房瓦面，地形很不利于防守，顽军居高临下，威胁很大。顽军先用枪打，后来又投了许多手榴弹，打了半天，几乎把两座土楼的瓦面都炸飞了，情况非常危急。

张世聪和陆新十分沉着镇定，一面指挥作战，一面做政治思想工作，鼓舞士气，坚持和国民党顽军战斗。张世聪观察地形，在地下选择一些墙根，挖了许多能够发挥火力的“炮眼”，有效地杀伤和堵住顽军，使顽军无法接近。张世聪又到楼上指挥战士射击山上的顽军，他还拿过周洪英的双筒枪，亲自和大家一起坚守，组织火力打击顽军，遏制顽军的攻势。顽军向土楼房顶投掷的手榴弹，大多是石井造的，有的穿过瓦面，有的穿孔落到楼板上，在危急中黄七哥（中队长）和周洪英（副中队长）急中生智，把将要爆炸的手榴弹迅速拾起，从窗口扔回顽军的阵地上。后来张世聪教大家搬床板和其他木板架成“人”字形，人就躲在里面坚持射击顽军，虽然顽军丢了许多手榴弹，但炸不穿木板，并无杀伤力。张世聪要大家节约子弹，顽军未接近不准打，没有把握不准打，省下子弹在冲出去时使用。张世聪号召党员要起模范作用，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并及时表扬英勇机智打击顽军的战士，他用历史经验说明革命战争的正义性和人民战争必胜的道理，教育和动员大家坚持战斗，他说：“过去保神党运动时，有个叫黄三吨的绿林首领，有一次三个人被围，他们打了几天，半夜安全撤出，敌人没奈他何。”又以勾刀水战斗为例，“我们被围困三天三夜，敌人打不着我们，反而被我们杀伤了大批敌人，最后我们十几个人还不是摸黑撤出，无一伤亡吗？这里是山区，离村不远就是山林，我们有群众支持，敌人是无法消灭我们的”。他那有道理、有事实的生动宣传和鼓动，给大家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一个个沉着战斗，不慌不忙，对胜利充满了信心。张世聪还派人推动土磨，隆隆作响，装成磨谷样子，又在厨房生火，摆出做饭样子，摆出决心坚持不懈的架势来迷惑对方。

武装队伍原来曾考虑当晚突围，并准备沿着村前的一条水圳冲出去，但那晚月光很亮，顽军封锁很严，两次派人出去试探均被压了回来，后来估计当晚顽军一定判断武装队伍突围，必定加强封锁，特别是对这条唯一有利于武装队伍突围的水圳更是严密防范，同时估计顽军在一两天内不可能调来更强的部队和炮火，再坚持一两天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决定当晚不突围。地形虽然不利，但两座楼房还可坚持，可以杀伤顽军和挫伤他们的锐气。打了一天，杀伤了一些顽军，武装队伍无一伤亡，大家信心倍增，派人轮流防守，决心拖住顽军，再打一个勾刀水式的战役。同时张世聪和陆新还作了第二手准备，挑选了黄七叔、周洪英、吴十四哥以及另外5个战士，随时准备在白天利用对方松懈的时候突然冲出，联络外面的队伍，约好傍晚冲击顽军，接应村里的队伍突围。

木头田村被顽军包围时，群众即到佛子塘向朱兰清报告。朱兰清找白石水区委宣传委员卢文商议，决定动员群众武装营救，当晚便集中了四五十人，到木头田附近山上，打枪

吹号，但由于缺乏战斗骨干，没有突破顽军的包围，救出队伍。

第二天早上，双方不攻不打，战斗沉寂下来，顽军围攻了一天一夜，已经疲劳不堪，松懈了，约9点时，顽军在后背山一带开饭，离武装队伍很近，碗碟的碰击声都传到村里。伴随顽军吵吵闹闹的声音，知道他们正忙于开饭，观察和监视顽军的武装人员发现远处的一些顽军背着枪吃饭。张世聪和陆新等看见隔着田垌对面山上的顽军离得很远，田垌没有什么兵，分析敌情后，估计顽军预料武装队伍白天不会突围，便决定趁其不备，当机立断派黄七叔、周洪英等5人突围出去，联络救兵前来配合解围。黄七叔、周洪英等5人冲出门口，跳下水圳，沿着水圳迅速冲向山边，待顽军发现有人突围时，黄七叔、周洪英等人已经迅疾地冲上离村几百米远的荒山上，不见踪影了。

黄七叔、周洪英等突围出去后，在寻找白石水区委领导的路上，遇见张存芳，他那时在廉中教书，放假回到家乡，队伍在木头田被围攻时，他便到一些村庄叫大家快去发动民兵救援。当他知道张世聪和队伍安全无恙，正要联络民兵前去解围时，才比较放下心来。

突围出来的人找到卢文、朱兰清之后，发动和组织了100多名武装民兵，分成两队，由黄七叔和周洪英分别带领，傍晚时出发前往木头田，并选定突破点，准备冲垮顽军，把被围的队伍接应出来。但到达木头田时，没有发现顽军，进入村子的武装队伍也不知到哪里去了。后来才知道，顽军没有信心攻下木头田，援兵又没有来，更怕突围的战士带来救援部队，便于当天下午5点左右悄悄地撤走了。陆新、张世聪也把队伍撤了出来，转移到柑村对面山上放枪扫射，骚扰驻村的顽军。

白石水武装军民挫败国民党顽固派的两次“围剿”，打了许多胜仗，士气更加高涨，对于坚持长期游击战争充满了必胜的信心。特别是张世聪的威信更高，群众都说他打仗最勇敢、最有办法，在他指挥下作战是一定能打胜仗的。张世聪英勇善战的许多故事，很快便传遍白石水地区和附近各地，张世聪在群众心目中，成了传奇式的革命英雄，革命群众对张世聪非常信赖和敬佩，而国民党顽固派一听到张世聪的名字便胆战心惊。

在一次庆祝胜利的军民大会上，张世聪在总结斗争胜利的经验之后，非常兴奋地说：“中国现在有了英勇强大的八路军、新四军等许多抗日的革命军队，有了陕甘宁等许多革命的边区，我们也应该能够打出一个新五军、打出一个新边区。只有这样，我们才无愧于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人民。”他的这个伟大抱负，代表了群众的愿望，获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这一段时间，地方区委发动群众的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开展工作已推进到北通和灵山县的武利、文利等地。1941年春，县委调走王克，派卢文任白石水区委副书记。

第八节 第三次反“围剿”与和平谈判

第一、二次“围剿”被打破以后，地方顽固派慌了手脚，国民党八区专员兼八区保安

司令邓世增连忙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增派军队“清剿”，蒋介石复电饬令邓世增亲自带兵“围剿”，并令他采取三分政治、七分军事的双管齐下办法，务必迅速肃清白石水的人民革命力量，恢复国民党顽固派所谓的秩序。邓世增给蒋介石的电报和蒋介石给邓的复电，均被在八区专署的秘密党员邓松及时抄送给中共合浦中心县委书记黄其江，因此顽固派第三次“围剿”的阴谋已被合浦中心县委事先知晓。老奸巨猾的八区保安副司令陈国勋得悉蒋介石给邓世增的复电之后，便建议改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因为根据他们的反革命经验，单纯使用军事镇压，只会增加人民的仇恨和反抗，是不可能达到消灭革命的目的。

1941年2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三次进攻。这一次进攻，是由八区保安副司令陈国勋指挥的，指挥部就驻在平山坡，主要兵力除已经驻在武装革命根据地内芳塘一带的正规军一个营，还有部分保安团队以及县自卫大队和各乡镇保队1000余人。这次进攻的特点是以重兵进驻，全面占领武装革命根据地更多的村庄，普遍建立据点，在军事上对武装队伍造成强大的威胁。同时放出和谈烟幕，开展政治诱降活动，企图威逼武装队伍就范。国民党顽军进入驻地以后，按兵不动，没有出动搜山、围村，也没有寻找武装部队作战，而是放出声气要找张世聪、朱兰清等谈判，和平解决。

1941年春节之后，驻在芳塘一带的国民党一七五师营长黄秉元了解到张世聪、朱兰清等人都是好人，是好打不平的，表示要找张世聪谈判，为了表示诚意，他主动把驻在山岐岭附近村庄的一个连撤走。后来他找到芳塘村的绅士张雅斋（是挂名的所谓“剿匪委员”），通过张世瑶的父亲张金声向张世聪转达他和谈的意愿。武装党组织研究后，同意和黄秉元谈，地点由武装队伍决定。

黄秉元要张存芳一同前往。一个晚上，张世聪派张体宽前去带路，黄秉元为了表示信任张世聪和游击队，把自己的左轮手枪交给张存芳，两人摸黑跟着张体宽去到粟米麓，这条小村的人早已并村搬到大的村庄去了。到粟米村时，张世聪和陆新已在那里等候，就在该村的禾塘屋见面。那时天气很冷，大家热情握手寒暄一番之后，便在禾塘屋内烤火，由张世聪和他谈，陆新化装成张世聪的警卫员，持着长枪在旁边跟着，张存芳等人没有参加，在另一间屋里烤火。

张世聪赞扬黄秉元和他的部队是抗日的队伍，奉命进驻本地区后，没有参加攻击白石水武装队伍的行动，对他们的正义行动表示感谢。接着，张世聪从怎样反对奸商运米资敌，主张抗日除奸，国民党当局镇压人民的抗日民主活动，烧杀掳掠，到白石水民众怎样武装自卫，主张讲和，团结抗日等整个过程和主张作了说明。黄秉元听了并不反对，但他提出许多问题，目的是想摸清武装大队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后来陆新从旁插话说武装队伍是主张抗日的，是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不管什么党派，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要团结抗日，只有各党派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战才能胜利，那些奸商运米资敌，破坏抗战，武装队伍才反对他们，等等。和谈了以后，黄秉元知道武装大队是进步

的和抗日的，不是什么“土匪”，但还怀疑武装大队是共产党领导的。

在回去的路上，黄秉元对张存芳说，看来张世聪讲的还没有什么，但那个带长枪的人讲的就厉害了，问张存芳认识不认识？张故意说不认识。

陈国勋到芳塘之后，要找武装队伍谈判，也是通过芳塘的张雅斋、张金声和武装队伍联系的。武装队伍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同意谈判。在谈判之前，陆新召开了武装队伍党组织和区委联席会议，研究对策，确定谈判的先决条件，就是对方首先撤出革命中心地带的一些据点，如楠木根、石牌坝、木头田等，表示对方的谈判诚意，才能开始谈判，并且提出和平解决的基本条件是：①停止武装进攻；②惩办造成事件的罪魁祸首李本清、黄南滨、梁文光等人；③赔偿群众损失，如烧毁的村庄，掳掠的物资等；④抚恤被害群众的家属；⑤保证当地人民民主自由和抗日权利；⑥不许逮捕群众等。武装队伍的先决条件是：停止武装进攻。决定由张世聪为谈判的全权代表。

陈国勋亲自出马，带了一个姓岑的参谋（廉州人），还有以前去谈过的黄秉元。这次还是由张存芳陪他们同去，仍由武装大队派人在晚上把他们带去，地点在搬空了的白水塘村。他们到之前，张世聪已派出周洪英、张体钦等10多个人在周围警戒，随身带了几个警卫，就在村里的一个厅房里，张世聪会见了他们。见武装人员的人个个年轻英俊，便说：“你们都是有为青年，钦佩！钦佩！”礼貌客气一番之后，陈国勋说了一通所谓的“党国利益”“息事宁人”等大道理。张世聪理直气壮地说：“日寇的铁蹄已经蹂躏到邻县灵山武利一带，现在又耀武扬威于廉北海面，李本清不去抗日反而率兵‘围剿’抗日武装队伍，难道这就是‘党国利益’和‘息事宁人’吗？”陈国勋连忙说：“好，好，我和张世聪先生两个人谈可以了。”于是，其他人都到厨房里烤火去了。

在谈判过程中，张世聪按预定计划提出和平解决的基本条件。陈国勋提出的条件是：①停止武装斗争，解散武装队伍；②缴出部分枪支；③要张世聪、朱兰清二人写悔过书；④张世聪、朱兰清二人离开白石水、大成地区，可到政府任职做事（即做官）或外出读书等等。

对于陈国勋的无理要求，张世聪正气凛然，一一加以严词驳斥，他说：“我们白石水、大成地区人民主动起来搞抗日救亡，保卫家乡，反对贪污勒索，反对运米资敌，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光明磊落，完全正确，没有什么错误，没有什么要悔过的，悔过书绝不能写，相反，李本清、黄南滨、梁文光破坏团结抗日，压迫人民，发动武装进攻，烧杀抢掠，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不但要他们写悔过书，而且应该惩办他们。我们既无过错，李本清发动武装进攻，我们被迫自卫，是理所当然，纯属正义行动，没有任何理由要我们缴枪，一枪一弹都不能缴，至于张、朱二人有行动自由权利，和平实现以后，是否离开，由其本人自行决定，任何人不得干涉。”关于停止武装斗争和解散武装队伍问题，由于党内已经决定把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已经不成问题。

谈判双方争论的关键焦点是，对方要武装人员悔过、缴枪，这是武装人员绝不能接受的；武装队伍则要对方惩凶、赔偿和抚恤，他们也是不肯接受的。经过反复争论之后，对方耍了个花招，说把缴出部分枪支改为缴一两支坏枪也可以，不写悔过书也可以，但要找些地方绅士写个证明书，证明张世聪、朱兰清二人不是坏人。张世聪坚决反对，指出他们是换汤不换药，实质还是认为投降有功，抗日有罪，断然拒绝。

谈判陷入僵局，陈国勋说他一个人不能作主，要回去报告请示，这次谈判就此结束。

陈国勋在回去的路上对张存芳等人说：“张世聪这些人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我们也是要搞社会主义的，陈铭枢也是要搞社会主义的，但是，现在时机未到，等到将来时机成熟，我们大家都是要搞社会主义的。”陈国勋说要搞社会主义是假的，但是，他知道张世聪等人是真正搞社会主义的，他也预感到社会主义已经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他的这几句话只不过是从一个侧面流露国民党统治阶级内部的彷徨与恐惧罢了。

此时，日军在广东沿海各地发动大规模的、海盗式的武装进攻，1941年3月初占领北海，威胁着合浦县的国民党统治中心廉州，国民党为了防守廉州，不得不放弃大规模“扫荡”白石水的计划，除继续驻守东馆、柑子根两个据点的兵力，其余队伍匆匆忙忙地开回廉州。

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三次武装进攻和他们的和谈阴谋一起破产了。

第九节 把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

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围剿”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更加孤立，困难重重。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更加扩大，群众的斗争情绪越来越高涨，武装骨干队伍和民兵得到了锻炼，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办法更多，胜利的信心也就更足了，这就出现一个十分有利的形势。

1940年4月，南路特委书记周楠到韶关向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汇报工作，谈到白石水群众武装斗争问题，张文彬认为：目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搞武装斗争不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会暴露地方党组织。按照党中央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三个原则，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无理；这些地区敌强我弱，不利；武装斗争进行那么久了，应该停下来，就是有节，在国民党统治区应执行中共中央关于隐蔽待机的方针。他指示周楠，要求把白石水的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具体措施是加强统战工作，扩大宣传，广泛发动群众，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把党的武装队伍分散隐蔽，保存好力量，撤退干部，特别强调要把张世聪转移到安全地点。周楠当时没有表示反对，但也没有立即执行。因为当时白石水武装斗争刚开始，为了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周楠回南路后没有传达和贯彻这一指示。1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中共南方工委；12月，决定撤销中共广东省委，另成立粤北省委、粤南省委，隶属中共南方工委领导，中共南路特委归粤南省委管辖。

1940年11月，日军从钦廉地区撤出，进入越南北部，这时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逆流逐渐形成高潮。为了更好地保存党的骨干力量，中共粤南省委根据原广东省委的指示精神，再次指示南路特委将白石水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并将白石水的主要干部安全转移，藏好枪支，解散队伍。为了帮助南路特委能迅速传达和贯彻这一指示，粤南省委派组织部部长王均予与周楠一起到南路工作。王均予到了南路后，为了顺利贯彻粤南省委的指示，决定改变南路特委机关的领导方式，改变南路特委成员集中在广州湾的状况，实行分片领导，单线联系，个人负责。雷州地区的工作由周楠负责，钦廉地区的工作由南路特委宣传部部长杨甫负责。南路特委还特别强调：各地党组织要继续贯彻“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停止一切容易引起党组织暴露的政治口号和政治活动，既要注意隐蔽身份又要适当斗争，在斗争策略上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1941年初，全国的政治形势迅速变化，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此时，中共中央发出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要求全党要集中力量痛斥亲日派阴谋家和内战挑拨者，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并要求在国统区内的党组织必须有序地隐蔽起来，进行坚决适当的斗争。6月，国民党加快在广东迫害和拘捕中共党员的步伐，驻韶关的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清洗”军中的共产党员，共有200多名共产党员或被捕或被杀，形势十分严峻。中共粤北省委迅速转移干部，做好应变准备。9月，中共南方工委对粤南省委发出指示：为适应长期斗争，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新形势，党的组织工作仍以巩固发展，稳扎稳打为主。对已被破坏及暴露的地区，应坚决执行周恩来的指示，割断已暴露的一切关系。根据这一指示的精神，南路特委常委杨甫在白沙宏德小学召开有黄其江、唐才猷、何达云（何杏雨、亚洪）等人参加的会议，传达特委关于把白石水武装斗争转为政治斗争的指示，决定立即停止白石水武装斗争，埋藏好全部武器弹药，主要领导骨干陆新、张世聪、朱兰清、卢文等迅速转移，已暴露的党员和群众迅速疏散。杨甫以“省委指示”的名义正式向中共合浦中心县委传达中共南路特委的决定。这一决定的主要内容是：“合浦白石水武装斗争在国统区内不符合统一战线政策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应马上解散武装队伍，停止武装斗争，把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此时，中共合浦中心县委领导成员尽管还不理解，但仍很快地将中共南路特委的决定向白石水区委和武装大队党组织作了传达，县委书记黄其江到白石水区，在红蛹村主持召开会议，传达南路特委的指示，参加会议的有武装大队党组织成员陆新、张世聪、朱兰清、廖上智以及白石水区委书记卢文、武装大队的重要骨干朱菊清等。黄其江在会上反复解释把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的意义，强调今后一切工作都要围绕“争取和平解决事件”这一方针进行，并提出了三项具体措施：一是在白石水区开展群众性的签名运动，联名请求国民党和平解决白石水事件；二是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上层人士本着“息事宁人”的宗旨出面调停，敦促国民党和平解决白石水事件；三是依靠党组织和各种进步力量，在全县范围内大造舆论，迫使国民党和平解决白石水事

件。陆新、张世聪、朱兰清、廖上智、卢文等听完黄其江的传达后，感到难以理解，思想不通。因为以前南路特委和合浦县委是支持武装斗争的，而且取得了很大胜利，开创了很好的政治局面。现在却说是破坏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要撤退武装大队，要把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他们认为，国民党顽固派武装进攻白石水人民，白石水人民被迫武装自卫，这有什么错误呢？国民党顽固派武装镇压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不正是破坏团结抗战、破坏统一战线吗？并觉得依靠上述一些措施来争取和平是靠不住的。尽管他们的思想不通，但这是上级党组织的决定，而且此时还没有提出取消武装大队、撤退干部，大家只好服从。事后按照上述措施去做，结果没有成效。

第十节 艰苦坚持

自从国民党顽固派第三次武装进攻计划破产以后，直到1941年10月发动第四次武装进攻之前，大约半年时间，出现一段军事沉寂的时期。这本来是扩大发展根据地，加强武装队伍建设的极好时机，由于上级已经决定放弃武装斗争，准备解散武装队伍，所以便很难有多大的作为，尽管当时大家思想不通，但是党的决定是不能不执行的。

在这个时期，武装队伍遇到一个非常突出的难题，就是经费和给养很难解决。白石水地区当时还没有建立政权，又不懂得征粮和收税，那么，武装队伍的给养和工作人员的活动费用如何解决呢？以前的解决办法是靠斗争区以外的党组织发动群众捐献，接收几间学校的学田粮谷，靠张世聪、朱兰清和一些革命群众的极力支持，以及武装队伍在战斗空隙搞点竹器编织出卖等，这些经济来源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已经越来越枯竭。为了解决给养问题，武装队伍一些人员去从事生产工作，如在一些要道路边开饭铺，做点小生意，上山砍竹制纸等，但所得甚微，解决不了多少问题。陆新和张世聪商议，决定把队伍开进深山，在麻风窝一带砍木烧炭，把木炭卖给附近的锅厂；到山上砍杂木烧山灰漏碱水和砍木头做木屐出卖等，但所得不多，生活十分艰苦。武装队伍人员经常吃咸菜和稀粥，许多人因营养不良而病倒，队伍没有蚊帐，山蚊特别厉害，患疟疾的人不少。

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武装队伍的领导人陆新、张世聪等人始终和战士们一起，砍树扛木，烧炭烧灰，同甘共苦，坚持奋斗。特别是张世聪，更是艰苦奋斗的模范，有时他家里或亲戚送来一点吃的东西，他总是和大家一起共尝，从来不多吃半点。确实没有办法时，他带着队伍转移到一些亲戚家附近的山头，靠亲友供应三两餐。有的亲戚看见他穿的布衫袖子都磨破了，主动给他一两件衣服，他总是婉言谢绝，说他家里还有，衣服破了补一下就可以了，待解放后再穿好的。

有一段时间陆新由于营养不良，患了夜盲症，当地叫作发鸡盲，白天还可以看见东西，一到傍晚和夜里，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张世聪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亲戚家里弄到一斤猪肉和一斤蜂蜜，把陆新安置到大山中的一个村庄，休息了一个星期。陆新那时还

年轻力壮，就靠这一点营养品，勉强恢复了健康，回到武装队伍。战士们病了，张世聪总是非常关心。有一次周洪英病了，他不但派人专门照顾，还多次亲自去看望，总要想办法弄点食物和药物送去。生活虽然极端困苦，但战士们的情绪都非常高昂。又有一次，张世聪派一些人送木炭到锅厂去卖，有个熟人送给他一小筐柑子，带回以后，他要分给战士吃，但数量很少，每人分不到一个，他便亲自动手，剥开平均分配，他一面分给大家，一面说：“有句俗语叫作‘分甘同味’，就是人人有份，将来我们革命胜利之后，分田分地，以后还要搞共产主义，大概也是这个意思，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我们现在扛枪打仗，也是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嘛！”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大成山区常有老虎出没，驻地附近常闻虎啸，有时就在营地周围发现老虎的脚印。有一次，赖传源（大赖）回原地区联系，返回麻风窝时，发现路旁有一个黄色野兽和他平行走，树林很密，看不清，他以为是黄猯。不久，老虎走出来，赖传源忙扔出一个手榴弹，老虎即往山下跑，手榴弹爆炸，没炸到老虎。他回到驻地跟大家讲，有些人听了之后，真有点“谈虎色变”之感。不过当地的华南虎个子很小，从来没有发生过老虎伤人的事，所以大家也不在意。

第十一节 第四次反“围剿”与自动撤退

1941年10月，陈国勋率领国民党保安第十团和一七五师一部，并调集附近多处乡保队，对白石水地区的以大成楠木根、木头田、三角塘、枫木根垌为中心的70多个村庄进行第四次军事“围剿”。中共合浦中心县委在陈国勋带队进攻白石水之前已得到确实的情报，县委书记黄其江赶到白石水区召开武装大队骨干分子会议，布置武装大队不要和顽军作战，秘密撤到外围六罗垌的高山上隐蔽，通知各村民兵骨干也撤到山上隐蔽，因而武装队伍完全避开了顽军。

顽军所到之处，任意抓人，把所有的青壮年男子和剪短发的妇女都抓去（因为参加武装斗争的妇女都是剪短发的），并把抓到的群众全部押解到顽军的扎营地去审查，让当地的反动分子去识别，辨认哪些是武装大队的骨干，哪些是民兵，哪些是支持武装大队的人，强迫他们自首、缴枪，有的则被强迫带路去搜山，妄图追击武装大队，逮捕武装大队的人员。当时被拘捕的群众有1000余人，顽军强令群众“自新”，把张体钦等40多人押到廉州坐牢，有20多人死于牢中（其中有共产党员张体春、李辉臣等3人）。与此同时，白石水区许多武装民兵在山上自动集结，决心和顽军战斗到底，根据挫败顽军三次“围剿”的经验，这些武装民兵信心和决心都很大。但是，他们到处都找不到武装大队，异常焦急，有的抱枪痛哭，预感到大祸临头，十分悲愤。其他群众见武装大队没有主动出击顽军，任由顽军疯狂围村、搜山、抓人，情绪也普遍低落下去了。

接着，国民党顽固派又分兵“驻剿”，很多重要的、较大村庄都驻有顽军，实行并村

围困，严加控制，妄图把群众和武装大队隔绝，困死、饿死武装战士。国民党顽固派还成立反动的“剿匪委员会”，利用一些“自首”的人去当保队，搞联防巡夜。当地山多林密，容易隐藏，就强迫群众斩树，使武装战士无藏身之地。还出布告、写标语，悬赏500大洋缉拿张世聪、朱兰清。总之，国民党顽固派用尽一切办法，企图消灭白石水人民革命力量。

正当国民党顽固派在白石水区到处疯狂围村、搜山、抓人，白石水抗日革命根据地和群众遭受严重摧残之时，合浦中心县委先后通知白石水区委书记卢文、武装大队特派员陆新到县委所在地白沙宏德小学布置工作。卢文和陆新回到白石水区后，召开白石水区委和武装大队党支部领导骨干会议，传达、贯彻执行南路特委的指示，把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解散武装大队常备中队，分散收藏武器，秘密撤退暴露的党员干部。其后，张世聪调到遂溪工作，朱兰清调到化州柑村，陆新调到合浦山口对达教书，朱菊清调到合浦公馆，廖上智调到合浦白龙的盐灶村，黄家祚、张体宽调到白沙崩岭，周洪英调到闸利晒盐，卢文调到灵山任中共灵山特支书记，其他武装斗争骨干和暴露的党员也都撤离白石水区。至于参加武装斗争的许多民兵骨干和积极分子，由于人数较多，当时不可能都作撤退安排，于是，有的离乡背井、四处逃生，有的被迫自首，有的被捕、被杀，还有许多群众被迫上山或逃往他乡躲藏，不少人弄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非常悲惨。这样，生机勃勃的白石水抗日革命根据地，很快便处于暗无天日的白色恐怖之中，坚持一年半的白石水抗日武装自卫斗争结束了。

解散武装大队，停止武装斗争后，白石水区人民群众很失望，埋怨情绪十分强烈。国民党顽固派对白石水区的革命群众肆意劫掠，在白石水经过长达一年多的“驻剿”，全面恢复保甲制度，加强反动统治，用种种方法向人民进行压榨。原来国民党政府征兵法规定，独子免征，两兄弟只征一个。但是，国民党顽固派蛮不讲理，不择手段，兄弟两人一起拉走，独子也不能幸免，青壮年男子基本都被拉光。在经济上又进行各种敲诈勒索，增加许多苛捐杂税，如户口捐、剿抚费等，广大群众的生活苦不堪言。因此，进一步激起白石水区人民群众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仇恨，使白石水区人民群众更加留恋以前的武装斗争，认识到只有武装斗争才能获得翻身解放。

高举抗日救国旗帜的白石水人民武装，在国民党顽固派的三次军事“围剿”期间，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这的确是重大的胜利。取得胜利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白石水地区反对运米资敌的斗争和组织武装队伍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镇压、“围剿”，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广大人民群众从多方面支持这场斗争，他们不但鼓励自己的丈夫、儿子或其他亲人参加武装队伍，而且从四面八方给武装队伍提供粮食、衣物、弹药，替部队送情报、当向导、护理伤病员。总之，由于广大人民群众支持武装队伍，反对顽军，武装队伍如鱼得水，而顽军则如盲人

走路，处处碰壁。

第二，参加武装队伍的农民觉悟高，决心大，作战英勇，加上这支队伍在组织起来之后，党组织又加强了领导，委派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张世聪和有指挥作战能力的陆新到武装大队担任领导，加强指挥。因此，这支队伍是有作战能力的，在指挥作战上，能正确运用游击战术打击来犯的顽军，而且又能在政治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丝毫没有侵犯工农群众及各阶层的利益，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支持。

第三，由于白石水人民的抗日自卫武装斗争是正义的斗争，不仅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支持，而且得到国民党内部有识之士的同情和支持。参加军事“围剿”的国民党正规军一位营长，当他了解事情真相后，在“围剿”中采取按兵不动的态度。著名抗日爱国名将蔡廷锴，当时担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随部驻灵山，邓世增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发电报给他，诬蔑白石水人民的正义斗争是“奸匪暴乱”，要求他出兵“清剿”。蔡廷锴派调查组到白石水进行实地调查，当他了解斗争真相后，拒绝出兵，提出“静候政治解决”。

此外，白石水地区山高林密，也是有利于武装部队开展游击战争的地理条件。

上述情况表明，这些条件不但有利于白石水人民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三次军事“围剿”，也有利于白石水人民把武装斗争坚持下去并逐步发展。

1940年4月，广东省委个别主要领导人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把处于战争区域和敌后区域的合浦看作国民党统治区域，把白石水人民在战争区域和敌后区域进行的抗日自卫武装斗争，看作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斗争，认为这种斗争违反了党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和顽固派斗争的策略，决定停止武装斗争。1941年10月，中共南路特委和合浦中心县委执行了这个决定，在顽军疯狂进攻面前，把武装队伍解散，把武器埋藏起来，把指挥武装斗争的主要领导干部张世聪、陆新、朱兰清和区委书记卢文等调离，置群众的灾难于不顾，任由国民党顽固武装在当地横行蹂躏，群众遭受捕杀、掠夺和折磨，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严重地挫伤了白石水地区和全县人民的革命斗争热情，对后来开展革命武装斗争造成很大的困难。

合浦很多革命者认为，合浦处于战争区域和敌后区域，而不是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合浦党组织在战争区域和敌后区域，领导白石水人民进行反对运米资敌的抗日救国斗争，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镇压、“围剿”时，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组织武装队伍，实行武装自卫，完全符合党中央制定的独立自主方针和武装自卫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在一年多的斗争中，虽然国民党顽固派拥有强大的武装，但由于人民武装具有种种有利条件，顽军从来没有打败人民武装，反而两次被人民武装所败，不能作出敌强我弱的结论。省委个别原主要领导人认为白石水武装斗争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违反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作出停止武装斗争，将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的决定，不符合党中央的独立自主方针和自卫政策，是错误的。